

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

信贷约束下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杨卫军, 张栓兴

(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8)

摘要: 我国农民收入偏低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水平偏低, 因此, 要提高农民收入, 就必须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然而, 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其难以向人力资本投资, 农村信贷市场的约束又使低收入的农民常常举贷无门, 因此, 农民常常会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由于信贷市场的约束并无破解良策, 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 必须在教育、农村医疗保障、劳动力迁徙等方面重塑政府职能。

关键词: 人力资本; 信贷约束; 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6)01-0032-05

The Rural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Constrained By Credit

YANG Wei-jun, ZHANG Shuan-x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Shanxi 710048)

Abstract: The key to peasants' low income is the low human capital level. So, the peasants' human capital must be improved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invest on the human capital with low income and poor peasants can't raise a loan because of the constraint of the rural credit market. As a result, the peasants often fall into "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Since there are not good measures to the constraint of the credit market and the institution lag is the key problem, the new institutions on education, rural medical insurances and labor migration must be arranged and the governmental function should be re-establish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ural human capital.

Keywords: human capital; credit constraint; governmental function

“三农”问题是新世纪我国面临的头号难题, 其核心问题是农民收入偏低。针对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 2004年初,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在该文件中, 中央从调整产业结构、

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等9个方面论述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1]。实际上近几年国内理论界研究增加农民收入时, 也大致是从这几个方面展开的。国外学者则多主张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加农民收入。例如,

收稿日期: 2005-03-17

作者简介: 杨卫军(1973-), 男, 陕西户县人, 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西安理工大学讲师。

项目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2年	2003年
纯收入	686.31	1577.74	2253.42	2475.63	2622.24
家庭经营性收入	518.55	1125.79	1427.27	1486.54	1514.28
工资性收入	138.80	353.70	702.30	840.22	918.38
转移性和财产性	28.96	98.25	123.85	148.87	162.5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 381 页。

西奥多·舒尔茨 (T.W.Schultz) 认为, 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对农民在教育、卫生保健、迁徙等多个方面进行人力资本投资^[2]; 盖尔·约翰逊 (Gale.Johnson) 认为, 只有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和质量^[3], 大幅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从而减少农业人口, 才能真正长期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4]。显然, 国外学者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农民收入问题更具说服力, 因为按照该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结论与要解释的经验事实更加一致。不仅农村内部, 我国的城乡收入差别同样源于人力资本的差异, 姚先国, 赖普清的研究证明, 农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 70%~80% 可以用人力资本来解释^[5]。因此, 要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 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

一、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既然人力资本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如此重要, 根据经济学的最大化原理, 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 就应当努力积累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的特征将保证他在长期内有一个稳定且较充裕的收入。但是, 为什么农民在为自己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所表现出的积极性却是有限的?

要理解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首先要理解农民行为。从总体上看, 经济学中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划分为两类: 一类强调农户的理性动机, 其代表人物为舒尔茨和 S. 波普金 (Popkin), 他们认为, 小农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 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在社会活动中, 都在按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行事, 这一原则被概括为“舒尔茨—波普金命题”。另一类则强调小农的生存逻辑, 代表人物为美国经济学家 J. 斯科特 (Scott), 他认为, 小农坚持的是“安全第一”原则, 即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首先考虑的是避免灾难而不是收益最大化^[6]。笔者认为, 对于中国农民而言, 理性动机和生存逻辑并不矛盾, 他们首先坚持的是“安全第一”, 生存无疑是他们行为的首要取向, 但在满足生存的基础上, 农民则变为理性的经济人, 并按最大化原则行事。

我国农民的生存逻辑主要体现在收入的多元化与支出的生存取向上。从上表可以看出, 由于来自于农业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 非农收入已经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实际以非农务工收入和农业收入共同维系家庭生存。中国自古以来小农经济“拐杖逻辑”的特点在当今农民身上依然存在, 农民成为现代社会中多元化程度最高而收入最低的一个群体。在收入水平的制约下, 农民不得不将食、住等基本生活需求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而较为忽视健康投资对改善自身福利的重要性, 并尽可能地压低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尽管近几年农民用于维持生存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不断下降, 但直到 2003 年, 食品、衣着、居住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仍在 60% 以上, 农民支出时具有明显的生存取向。在这种背景下,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 在满足生存的基础上, 农民也在尽量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1990 年以来, 我国农村居民用于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支出在显著增加, 年均增长约 1%, 到 2003 年总比重已超过 26%。客观地看, 其中医疗费用的增加更多是被动的, 文化教育开支的增加同时具有被动和主动的因素, 而交通通讯开支的增加则更多是主动的。从文化教育和交通通讯开支的增加来看, 农民显然在按最大化的原则行事, 他们也期望从人力资本的投资中获取收益。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我国农民在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积极态度, 虽然不能精确计算出收益, 但农民感到, 子女受教育的长期收益率是最高的, 因此满足生存之外的有限的资源要保证优先用于子女教育。

综上所述, 由于收入不足, 因此农民的支出首先必须满足家庭基本生存需要, 其次才能投资于子女的教育, 最后才是除子女教育之外

的其他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如子女的健康、自己的教育、健康等。但是，农民的收入仅仅能满足子女教育的一部分，更不用说其他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了。如果农民仍希望对其他方面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话，就只能通过借贷市场求助于其他主体了。

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所面临的信贷约束
信贷市场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当信贷市场完善时，其不仅可以提供给农民必要的资金使其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且信贷交易还能允许人们在波动收入流的情况下平滑其消费，从而起到相当重要的抵御风险的作用。然而，几千年来，中国的贫困农民一般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或消费。他们获得资金无非是通过以下三条途径：

1. 友情借贷。自古以来，友情借贷一直是中国农民从其他主体获得资金的首选。一般而言，友情借贷是不支付利息的，但是，农户将不得不为此付出“面子成本”，即人情账，或以帮工等其他方式对债权人予以补偿^[7]。问题在于，农民的家族血缘和友情的圈层毕竟十分有限，而且似乎还存在着一个未经系统验证但符合经验的现象——穷人的亲戚大多是穷的。因此，对于贫困者而言，亲戚朋友能够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例如在面对子女上大学时天文数字般的学杂费时，亲友可能有心无力。2003年，陕北学生景艳梅的父亲就是四处借贷无门以后自杀的。

2. 从正式金融机构处贷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国家正式金融机构曾一度延伸到农村，但由于在贫穷地区，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和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支撑其运行成本，因此1990年代起，国家商业性金融机构纷纷选择从农村撤离。对于那些少数仍存在于农村的商业性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组织而言，贷款时则不得不面临由于和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难题。而抵押贷款由于缺乏合适的财产抵押物而供给不足——农民的不动产（房子）对金融机构而言并不值钱，农民又没有土地的产权，当农民欠贷不还时，并没有可靠的实施机制来保障正式金

融机构的利益。另外，由于单位资金交易成本太高，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正式金融机构并不愿意与农户打交道。因此，除了偶尔向农户提供一些政策性的小额扶贫信贷之外，农民从正式金融机构处获得资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实际是不可能的。

3. 高利贷。同正式的金融机构相比，农村广泛存在的高利贷确实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借贷双方相互比较熟悉，信息相对对称，放贷者能有效避免正式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逆向选择难题。另外，由于常常与黑社会勾结，高利贷也能够有效地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赖债不还的情况比较少见。当然，这种实施机制是违法的。但不论对于农民还是高利贷的放贷者而言，长期用高利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不可能的，因为高利贷的利率和偿还期限都不允许这样做。

由此可见，在目前信贷市场约束下，低收入农民是难以筹集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需的资金的。由于收入与人力资本之间有着很强的因果关系，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上存在的报酬递增，再加上不完善的信贷市场，将导致贫困陷阱的出现，进一步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富裕的人有钱投资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递增使其更加富裕；穷人无钱又借贷无门，无法投资于人力资本，因此无法赚取较高的收入，将会继续贫困^[8]。由于信贷市场失灵被认为是持续贫困的关键因素，对这个市场干预就成为反贫困政策的一个取向。在过去的30多年，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试图向穷人提供贷款，包括我国的小额扶贫信贷。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失败的案例要远远多于成功的，即使那些成功的案例，也多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取得的，很难有推广价值。在农村信贷市场的完善上，只要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和实施机制的问题，任何措施都会以失败而告终，这一点已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反复验证。

三、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关键在于提升政府意愿

现代经济学认为，基础社会服务、人力资

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以及为社会的薄弱阶层设置的综合网，实际上都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范畴。由于市场和私人机构无法实现，就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当市场无法解决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时，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发挥应有的功能。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相关制度安排却在抑制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使农民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的权利。对我国而言，只有真正改变国家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的城市偏向，提升各级政府在农村教育和培训、健康和医疗卫生及劳动力的转移等方面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支持意愿，才能促进农民人力资本的持续增加，从而提高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局面。

1. 农村教育和培训方面

教育和培训一直被视为是人力资本积累最基本的途径。农村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目前我国农村的这两种教育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基础教育方面，目前的状况是国家将其丢给财力匮乏、债务缠身的农村基层政府，2002年全国县级教育事业费1578亿元，占全国县级财政支出6313亿元的25%，占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2582亿元的61.1%，而中央只占其中的10.3%^[9]。在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方面问题更严重，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很低，国家有组织地针对成年农民的技能培训很少，农民技能的提高更多地是通过自发地“干中学”实现的。

由于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国家的责任是不能推托的，因此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国家在这方面支出意愿一直不强的落后局面。一方面必须加大教育经费的总投入，尽快实现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4%”的目标。另一方面，必须改变目前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向，农村义务教育应由中央财政负责，中央财政性教育经费更多地投到农村的义务和职业教育中去。在当前国家财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这两点完全可以做到。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只有把

义务教育办成真正的义务教育，而不是目前的收费教育，才可以使农民子女在接受教育时的成本大大降低，从而降低其人力资本积累的难度，延长农民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只有把更多资金投入农民的职业教育，才可以使农民掌握更多的技能，从而增加其获取收入的能力。

2. 健康和医疗卫生方面

由于农民所从事的多是体力劳动，身体健康状况是决定农民劳动收入的关键因素，身体状况甚至比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更大^[10]。然而，改革开放后，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等方面并未尽职尽责，从而导致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农村人口缺乏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质量低下、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的存在。农村人口的一些健康指标开始恶化，无钱看病、无钱买药的现象比比皆是，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数与日俱增，许多农民因此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

鉴于健康与贫困紧密的联系，国家增加农村人口的健康投资已成为消除贫困、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政府在农村卫生发展，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像预防免疫、妇幼保健、改水改厕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提供。当前政府应重建农村公共卫生系统，并投资于农村医护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增加对农村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及营养和生活习惯干预项目的投资，实施医疗救助计划，缓解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11]。

3. 劳动力的转移方面

劳动力转移对于增加农民收入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个农民从农业转向当地非农业工作将会使家庭收入增长13%，在外地打工将会使家庭收入增加49%^[12]。然而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政府并没有为劳动力转移提供必要的培训、服务和信息；而且户籍制度、市场准入制度还大大地限制了劳动力的转移；此外，在很多地方，政府也未很好地履行保护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义务，所以，农民迁徙的积极性也有所降低。

因此,在劳动力的转移方面,政府首先应尽快废除户籍制度以及与此联系的城市社会服务,真正给予农民工以国民待遇,并采取切实措施,使农民工在子女教育等各方面能够享受到公平费用下的待遇。其次,废除各种政府就业部门禁止或者限制雇主雇佣外地人的市场准入制度,应通过法律,禁止以户口等作为雇佣劳动力或进入某一行业的附加条件。再次,通过各种渠道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必要的培训、服务和信息,使这些劳动力的素质能够适应相关产业对其的基本要求,以增强其向其他产业和地区转移的能力。最后,加大立法和执法的力度,履行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义务,并坚决打击违法使用农民工的行为。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04- 2- 9 (1- 4).
- [2] 西奥多·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3] D. Gale Johnson (2001a), "The Urban-Rural Disparitie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Rural China," Offi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aper No. 01- 01.

- [4] D. Gale Johnson (2001b), "Can Agricultural Labor Adjustment Occur Primarily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Rural Nonfarm jobs in China," Offi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aper No. 01- 01.
- [5] 姚先国, 赖普清. 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 [J]. 经济研究, 2004, (7).
- [6] 张杰.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 结构、变迁与政策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7] 同 [6].
- [8] 普兰纳布·巴德汉, 克里斯托夫·尤迪. 发展微观经济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9] 傅光明. 政府为农村义务教育买单到底需要多少钱? [A]. 三农中国, 2004, (2) [C].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 [10] 侯风云. 农村外出劳动力收益与人力资本状况相关性研究 [J]. 财经研究, 2004, (4).
- [11] 朱玲. 政府与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选择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4).
- [12] 赵耀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 [J]. 经济研究, 1997.

[责任编辑 崔凤垣]

(上接第 54 页)

参考文献:

- [1] 周皓. 北京市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状况及对策研究. 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研究报告, 2003, 4.
- [2] 周皓, 陈玲. 对流动儿童学校之合理性的思考与建议. 人口与经济, 2004, (1).
- [3] 赵树凯. 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北京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初步调查. 管理世界, 2000, (5).
- [4] 叶之红, 谈松华, 谢维和, 项贤明. 化解难点: 加强流动人口及移民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上海高教研究, 1997, (6).
- [5] 汪明. 人口迁移与适龄人口教育问题的宏观背景研究. 上海高教研究, 1997, (6).
- [6] 周皓. 我国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状况及比较分析. 南方人口, 2001, (2).
- [7] 吕绍青, 张守礼. 城乡差别下的流动儿童教育——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 战略与管理, 2001, (4), 95-108.
- [8] 余舰, 吴树琴, 胡建余, 林军燕. 我国部分地区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情况调查报告. 教育研究, 1997, (9).
- [9] 周皓, 章宁. 流动儿童与社会融合.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4).
- [10] Chen X., Rubin, K. H., & Li, B. Depressed mood in Chinese Children: Relations with school performance and family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5, 63: 938- 947.
- [11] Dong, Q., Yang, B., & Ollendick, T. H. Fears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Childre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94, 35 (2): 351- 363.
- [12] Kovas, M.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 Manual*. Toronto: Multi- Health Systems. 1992.
- [13] Asher, S., Parkhurst, J. T., Hymel S., & Williams, G. A. Peer rejection and loneliness in childhood. In S. R. Asher & J. D. Coie (Eds.) *Peer rejection in Childr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53- 273
- [14] 同 [1].
- [15] 同 [2].
- [16] 韩嘉玲. 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 青年研究, 2001, (8)、(9).
- [17] 同 [2].

[责任编辑 童玉芬]